

# 战后70年日本的东南亚外交

## ——经济外交的开启与发展

白如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东南亚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历来为大国的战略关切。作为战后地区外交的原点,日本成功推展了经济外交。通过战后赔偿、政府援助、经济合作、朝野交往等全方位努力,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日本与各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关系也得到稳固和强化。尽管个别阶段出现过政策失误,但总体上日本适时实施了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游刃于中、美、日、俄等大国间施展平衡外交的东南亚国家,也乐见日本的资金技术援助。中国崛起及与东盟关系迅速推进,使日本感到竞争压力,并积极寻找应对措施。

**【关键词】**战后日本; 东南亚; 经济外交; 区域合作; 亚太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133.135.53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123/j.cnki.issn.1000-355x.2015.06.002

**【文章编号】**1000-355X(2015)06-0013-08

**【收稿日期】**2015-08-26

**【基金项目】**本文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支持

**【作者简介】**白如纯(1968-),男,辽宁省锦州市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 引言

战后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并在内部共识、外部协调、对方妥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得以实施。内部共识的基础是受战争重创的日本为谋求生存的本能性选择,即满足资源、能源与市场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外部协调源于美国的认可和进一步的撮合,美国政策因素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sup>[1]</sup>曾受到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东南亚各国,对与日本的外交重建乃至经济往来心存余悸,但美国的授意和撮合,使东南亚国家在对日外交方面的担心减轻,相关国家也需要日本在赔偿方面做出具体行动。

中国与朝鲜半岛近代以来长期担当了日本兴起“后方保障”的角色,同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也最为深重。二战结束后中国内战连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采取了对苏“一边倒”战略,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以及苏联在该地区存在的影响力,使得日本恢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在短时间内难见预期。但朝鲜战争爆发、《旧金山和约》生效,给日本地区外交(主要是对东南亚)带来转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尽管一波三折,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

其在东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与稳固。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巅峰时,“雁行发展”序列中日本“领头雁”地位确立,“东南亚是日本后院”似乎成为一个常态。在成为“正常国家”信念的助推下,在政治安全方面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寄予厚望。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好感也大幅提升,乃至在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各国产生了要由日本而非美国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认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推进,对日本的“地区主导梦”形成挑战。中国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倡议并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日本的危机感自不待言。2010年前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出台,日本配合美国步调,大大增加在安全领域的投入。同时,在东南亚与中国“一争高下”的姿态日趋明显。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在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以及强化美日安保等方面强行突破。中日关系也因日本“购岛”闹剧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围绕南海岛礁主权的争端出现复杂化趋势,东南亚地区再度成为众多国家关注的焦点。

### 一、经济外交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核心(1952~1966年)<sup>①</sup>

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是“经济外交”。战后,在“美主日从”框架的束缚下,日本为解决产品市场、资源和能源严重短缺的困难,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战略,即扩大海外市场、拓宽海外能源与资源进口渠道成为其迫切需求。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是战败前日本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长期与新中国处于无邦交状态。同时,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和旧殖民地纷纷独立,也断绝了日本资源、能源的来源渠道。争取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市场成为日本的优先选择。

重返东南亚的目标,并非日本政府一厢情愿就能轻易实现。作为战败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济的情况下,日本难以支付对多国的巨额赔偿。经美国居间调和,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各国最终接受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由企业支付产品、提供劳务等作为赔偿替代方式。这样既解决了对相关国家的赔偿,也带动日本国内企业的“复活”。由赔偿开启的经济外交最终成为日本重返地区外交舞台的突破口。

凭借成功重返东南亚、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特需”及战后处理的顺利进展等有利条件,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1954年10月,日本以援助国身份加入“科伦坡计划”,<sup>②</sup>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实力,日本巩固并增强了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日本对东南亚的产品出口以及资源、能源的进口迅速增加。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组阁后,“经济外交”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鸠山力主“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谋求与东南亚诸国正式建交并建立经济关系”。<sup>[2]</sup>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后,破例在访美之前首先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多国,并成为战后首位任上访问东南亚国家的日本首相。同年,外务省在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

<sup>①</sup>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占领状态下的日本外交处于“不能自理”境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得以主权国家身份开始着手处理战后赔偿问题。正文标示的各阶段具体年份,依据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属于笔者的个人判断。

<sup>②</sup> “科伦坡计划”始于1950年,全称“南亚和东南亚合作经济发展科伦坡计划”。目的是通过对该地区的援助,获取潜在的资源。英、美、澳、新等经济发达国家及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参加。日本在经济恢复后,成为新的援助方成员。

阵营协调、做亚洲一员。“坚持作为亚洲一员”成为其后日本领导人的“口头禅”之一。

1965 年 4 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亚洲经济开发构想”,<sup>①</sup>日本政府认为配合好该构想,将是强化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大好机会。1966 年 4 月,日本举办了有关东南亚问题的部长级会议,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举办的有欧美及亚太地区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日本政府希望借机展示其地区外交的“自主性”,通过加大援助与合作的力度,博取东南亚国家的好感。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间围绕战后赔偿的谈判基本完成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sup>②</sup>日本成功的经济外交,促进了其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相关各国对日印象和舆论逐渐好转。

## 二、东盟成立后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1967~1989 年)

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强化经济关系构成日本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的基本内容。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首访东南亚显示了日本对东南亚的重视。但东南亚国家试图通过联合实现自强却并非日本乐观其成的选项,1967 年 8 月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及马来西亚 5 国发起成立地区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日本最初对该地区组织的成立持消极态度,因为日本的外交思维基本上还是把东南亚当作其“后院”。<sup>③</sup>

日本推进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关系的同时,与相关国家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些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为日本企业只注重商业利益而缺乏与当地人的交流和沟通。日本企业的垄断式经营和过度开发,甚至达到威胁当地民族企业生存的严重程度。日本人的“傲慢与偏见”溢于言表,血汗工厂大行其道,招致当地民众的疑虑与戒心,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感情被重新引燃。1975 年初,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期间作为重要合作方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集会和游行,有些地方甚至发展为发泄针对本国政府对日妥协不满情绪的暴动,即所谓的“东南亚冲击”。<sup>④</sup>

为平息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弥补日本与各国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和感情裂痕,1977 年 8 月,借东盟成立 10 周年之机,田中角荣的继任者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改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新政策宣言,即:(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3)以平等合作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的和平以及繁荣做出贡献。该演讲冠之以“福田主义”美称被大书特书。“福田主义”所表明的主张,是在总结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经验基础上,基于 70 年代内外环境变化,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sup>[3]</sup>

此间,在与东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方面,日本也精心设计并逐步推进。早在 1974 年,日本曾

<sup>①</sup> 约翰逊构想的主旨是使用非军事的经济手段,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参见「東南アジア開発関係会議の開催と日本外交」,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際政治研究の先端 3』。

<sup>②</sup> 1952 年 4 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与东南亚各国解决赔偿问题的同时,加速建立外交关系。1954、1956、1958、1959 年日本分别与缅、菲、印尼、越建立外交关系。到 1977 年 4 月,日本支付最后一笔对缅赔偿,最终完成对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赔偿。

<sup>③</sup> 对 1967 年东盟成立的消息,日本平面媒体只做了简要报道,次年《外交青书》也是简要记载。到 1971 年东盟外长会议发表《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日本态度发生转变。

<sup>④</sup> 20 世纪 60、70 年代,日本先后遭到“尼克松冲击”、“石油冲击”和“东南亚冲击”。三大“冲击”之下的日本政府,反思“经济外交”过程的缺欠,是为“福田主义”出台的主要原因。

倡议发起双方文化交流活动,即每年组织300名左右年轻人乘坐“日之丸”号客轮,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港口停泊。通过游览各地名胜、进行家庭访问及体验等方式增进相互理解。1980年,日本设立“东盟青年学术基金”项目,每年提供100万美元为东盟国家的学生提供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机会,此后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时期,1984年日本设立了“面向21世纪的友好项目”,以继续保持民间层面的亲密交往。

### 三、冷战后混沌期日本的东南亚外交(1990~1997年)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进入重新调整期。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1991年前后,推动柬埔寨和平成为东南亚需要迫切解决的焦点问题,日本政府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柬埔寨维和行动,希望藉此加大对东南亚政治外交的力度。

1991年5月,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在访问东盟期间,于新加坡发表演讲,认为21世纪初期将出现由东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东盟各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结成的“繁荣的三角形”;并希望日本和新加坡成为两个重要支点,推动东南亚地区的繁荣;同时表示日本希望为当时的东盟各国与越、老、柬三国结成合作与伙伴关系提供支持。<sup>[4]</sup>

由于对推动包括东盟及越、老、柬、缅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共同繁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根据海部俊树首相的建议,1992年日本筹办了“柬埔寨复兴”东京国际会议。此外,外务省还于1993年开始筹办“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1993年1月提议,1995年2月实施)。同期,时任通产相桥本龙太郎倡议成立“印度支那产业合作组织”,并由泰国举办了由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日本参加的国际会议。日本学者认为,十国大东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sup>[5]</sup>

桥本龙太郎就任首相后,于1997年东盟成立30周年之际访问东南亚。日本政府对桥本的出访寄予极高的期望,基调定为发表与“福田主义”同等重要的“桥本谈话”(一说“桥本主义”),目的是提升日本与东盟的双边关系。日本重返地区外交成功后直到桥本访问前,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基本局限在经贸领域。桥本访问,日方希望加强对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桥本还提出强化日本与东盟双方在首脑对话及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一个关键的建议是把双边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的定期会晤机制。<sup>①</sup>桥本演说体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提及历次首相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不做军事大国”的一贯承诺;二是主张建立以“日本援助为主”以及“相互协调与合作为主”的新型双边关系,侧重于在政治与安全方面扩大合作范围。

###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区域合作政策的新变化(1998~2009年)

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速发展,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尤其是东亚地区完成了由协调者到组织者再到领导者的角色转换。这期间,日本始终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地以及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工业产品及相关技术在东南亚保持着垄断地位。

<sup>①</sup> 桥本提议的日本与东盟举行首脑会谈的建议,成为“东盟+”模式的开始。只是东盟国家忌惮日本做大而疏远中国及相关国家,借机提出东盟再与中国、韩国并与中日韩集体的首脑会谈,即3个“10+1”及“10+3”框架。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一体化的发展带动了新一波地区主义的兴起,区域经济合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作为东亚“优等生”的日本已然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探索者与倡导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前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日本中心主义”的特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表现积极。“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使以日本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东亚经济圈构想”等受到冷落,加之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式微。

但 1997 年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并波及整个东亚。危机发生后,日本对东南亚有关国家提供了巨额信贷支援,使东南亚对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重新充满期待。日本也一度改变了之前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言必称亚太、合作不离美国”的态度,积极参与以东盟为平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由于日本区域合作构想中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的阶段与层次模糊不清、战略重点不确定,其结果是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圈”或者“东亚经济圈”,更不用说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与欧盟和北美相抗衡了。但作为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探索阶段,日本力图通过经济外交方式推动地区合作,将东南亚各国纳入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尝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的转变,与中国加强同东盟的联系并参与本地区合作的积极态度有很大关系。2001 年 11 月,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双方提出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该设想如能按计划实现,中国无疑将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竞争中占据先机。<sup>[6]</sup>2002 年 11 月,中国、东盟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将于 2010 年建成拥有 17 亿人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如此快速地与东盟签订协议,日本方面的危机感不言而喻。就在中国与东盟签订协议的次日,日本宣布有意与东盟签订有关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

日本意识到自身的东亚合作政策滞后已经使中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领先者,因而试图改变一直以来的消极态度,以免沦落到被边缘化的窘境。2002 年 1 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了关于东盟政策的演讲,成为 1977 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并发表著名的“福田主义”和 1997 年的“桥本倡议”以来,日本对东盟发表的新政策主张。日本对小泉首相在演讲中提出的 5 点主张进行了追加说明,<sup>①</sup>即在“10+3”框架基础上,增加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扩大版的区域合作,并指出美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极其重要,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因而被舆论批评为“基本与 APEC 内涵相同”。<sup>[7]</sup>

在 2002 年度与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日双方都曾得到东盟国家的建议,即邀请两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出于可能影响到“日美同盟”关系的考虑,日本未能即时与东盟达成默契。2003 年 10 月,第七次东盟与中国首脑会议(“10+1”)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 个月之后,日本政府正式表明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向。2003 年 12 月,东京举办首届“日本与东盟首脑特别会议”,双方共同发表旨在加强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全方位关系的《东京宣言》以及配合宣言落实的《行动计划》。特别首脑会议肯定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共

<sup>①</sup> 小泉首相的 5 点主张包括:一、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二、将 2003 年定为“日本·东盟交流年”;三、“日本与东盟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四、举办有关东亚开发的会议;五、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体”设想,同时宣布启动日本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本次首脑会议上,日本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系列行为表明日本同东盟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方面实现了新的跃进。

总之,日本从冷淡、消极对待中国和东盟提出的地区合作主张,转变为明确参与东亚区域内的双边伙伴关系协定,再发展为积极推动并力图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纬,显示其东亚区域合作政策“被动性转型”的特征。如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也只是出于自身利益和维系日美关系的考虑。<sup>[8]</sup>

## 五、“再平衡”背景下日本的东南亚外交(2010年至今)

历史经验证明,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前提是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间力量的相对平衡。但各国求生存、谋发展的结果表现为行为体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战后70年间,尽管冷战漫长、热战不断,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流动中不断调整,大国间以及各主要国际行为体集团间维持着微妙、稳定的国际关系。

2010年前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及“再平衡”战略。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快速崛起是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重要考量。但美国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似乎依然是从全球战略出发,以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力量格局的新变化,并谋求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过程中占据主导优势。借助美国“重返亚太”的契机,日本大力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高调宣称与东盟及相关国家加强在海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个别东盟国家因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也主动与日本拉近距离。<sup>①</sup>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尤其以援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力度有增无减。2009年11月,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主持首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5国首脑会谈,并发表《东京宣言》与《行动计划》。其后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谈、3年一轮的“援助周期”成为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新机制。安倍晋三二次执政后,沿袭民主党时期的惯例,2013年年初副首相麻生、首相安倍相继出访东南亚,兑现对缅甸“减债”承诺,重申日本重视东盟的一贯立场。从民主党鸠山内阁的《东京宣言》、野田内阁的《东京战略2012》,再到自民党安倍政权《新东京战略2015》陆续发布,援助金额由5000亿日元至6300亿日元再至7500亿日元逐次递增,日本对东盟外交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贯善于在大国间施展“平衡外交”的东盟国家,希望在中、美、日、印度以及俄罗斯等大国间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配合2015年年底建成东盟共同体,按照“地区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预计时间表,即2013年年初启动、2015年年底完成谈判的路线图,东盟维护自身利益,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意图显而易见。RCEP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应激反应。

## 六、战后日本东南亚外交的总结

通过对战后70年间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梳理,日本的东南亚外交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

<sup>①</sup> 2011年10月,越南总理访问日本,双方就日本对越出口核电技术和合作开发稀土资源等达成一致,目前越南已成为日本最大对外援助国。

1. 经济因素贯穿始终。战后初期日本为实现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优先开启了东南亚外交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能快速走上复兴之路有着诸多原因,但在东南亚地区成功实施“经济外交”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至今,“经济外交”依旧是日本与东盟关系中最重要关键词。

2. 政治议题逐渐显现。密切的经济关系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政治议题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绕不过的门槛。主要原因有如下 3 个方面:一是前期日本在开发东南亚资源期间,其“经济动物”的特质导致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迫使日本政府从政治外交的高度重新审视双方关系;二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即日文的“普通国家”)的政治诉求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配合,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不可或缺;三是日本希望配合东盟个别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手,以形成处理中日东海争端的有利局面。

3. 美国影响如影随形。不论是重启东南亚外交,还是表达“政治大国”的诉求,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推进地区经济与政治外交不会如此迅速。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表明,日本的诉求与美国的需要互为表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淡出”与“回归”都成为日本的机遇。东南亚国家先是在美、日双方间,其后于日、美、中、欧盟以及更多方的势力平衡中获取经济与政治利益。

4. 重点调整稳健及时。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经历频繁的政党轮替与内阁改组,但对东南亚外交的重视程度并未受领导人更迭、政党轮替等国内政局的变化断档和减弱。除个别首相因“意外”未能成行,<sup>①</sup>执政后首访美国再访东南亚成为日本总理大臣“必修课”。个别首相甚至在组阁后访美之前,优先访问东南亚以获取与美谈判砝码。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基于经济领域以及政治安全政策的需要。经济主导、贸易立国时代,日本把资源开发、市场扩大以及技术转让等作为优先选择。当“正常国家”成为目标时,政策重点向政治安全领域倾斜便顺理成章。由此出现的调整内容包括政策议题调整、援助对象(国家和项目)调整等诸多方面。

## 结 语

2015 年是“东盟共同体”成立的节点,有西方学者认为东盟将继中国、印度之后崛起为“东方第三极”。东盟目前是第四大出口联盟,贸易量为 2.5 万亿美元,预计在 2020 年将达到 4 万亿美元,并会在 2050 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球每年有超过一半的商船经过东盟的海上通道。而东盟人口中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劳动人口增加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东盟市场被国际看好。日本对东南亚投入巨大,自然不愿失去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战后 70 年间,日本凭借成功的“经济外交”,在东南亚如鱼得水几无比肩者,对东南亚外交成为日本地区外交的重头戏。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经济到达巅峰之后增长乏力,但作为经济强国依然保持着该地区主要影响势力的角色。梳理战后至今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全过程,总结各时期的政策特点,本着取长补短的态度趋利避害,对中国增进与东盟关系,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伯江.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J]. 日本学刊, 2013 (2): 3-15.

<sup>①</sup> 如羽田首相等短暂执政,但几乎所有的首相在任职大臣期间均频繁出访东南亚。

- [2] 古川万太郎. 日中戦後関係史[M]. 原書房,1988:76-77.
- [3] 白如纯. 战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与中日关系[J]. 日本学刊,2006,(6):81-93.
- [4] 外務省. 外交青書[M]. 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91:401-410.
- [5] 山影進. 日本のASEAN政策の変容[J]. 国際問題,2001,(1):60.
- [6] 朝日新闻中国将主导亚洲经济[N]. 朝日新闻(社论),2001-11-07.
- [7] 山下英次. 小泉首相の东南亚外交政策演说(2002年新加坡演说)及其评价[J]. (日)经济学人,2004,(2):14.
- [8] 赵洪. 日本与东亚经济合作[J]. 当代亚太,2004,(3):48-52.

责任编辑 孙慧宗

## Japanes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war Era: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iplomacy

BAI Ru-chu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of Southeast Asia are the strategic concern of great power. As the origin of Japanese regional diplomacy after the war, Japan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economic diplomacy. Japan get huge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all the efforts such as post-war compensation, the government ai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each court and the commonalty, at same time Japan stabilize and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and security. On the whole, Japan implemented th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policies in time although some policy mistakes made at some stages.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o implement balance diplomacy among China, USA, Japan, Russia, etc., wish to receive Japan funds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China-ASEAN rapidly advanced relations since the rise of China make Japan feel the pressure and seek countermeasures actively.

**Key Words:** postwar Japan,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diplomacy,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e